本版编辑：李步前 版式设计：张 慧 E-mail:f4@studytimes.cn Tel:010-68922368

孙中山以国共合作推动中国革命

□ 沈成飞

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他倡导和践行的统一战线政策、三民主义政治纲领、艰苦奋斗精神被毛泽东称赞为“留给我们的最中心最本质最伟大的遗产”。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学习、继承、发扬他的宝贵精神，就要坚持统一战线、持续巩固和发展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第一次国共合作就是孙中山致力于坚持统一战线、发扬团结精神，推动中国革命迈入全新历史阶段的伟大实践。其间，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创造性地推动和维持国共合作，在世界革命发展的历史大势中，对近代中国革命发展、统一战线形成，以及中国革命未来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出联俄合作的重要决策

辛亥革命终结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中国之情况不但无进步可言，且有江河日下之势。军阀之专横，列强之侵蚀，日益加厉，令中国深入半殖民地之泥犁地狱”。共产党人认为产生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全国资产阶级之多数缺乏阶级间利害不同的觉悟，所以始终依赖他们的敌人——封建的北洋派，而漠视或更至嫉视他们的友人——民主的革命党之故”。孙中山毕生奔走革命，但护法运动失败，革命成果屡遭颠覆。他一度感慨，“吾三十年来精诚无间之心几为之冰消瓦解，百折不回之志几为之槁木死灰”。1922年6月，陈炯明部兵变更是其革命生涯中最为惨痛的挫折。孙中山不得不承认：“综十数年已往之成绩而计效程功，不得不自认为失败。”

其时，十月革命的胜利及其发展重塑了20世纪世界革命格局，推动全球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为孙中山之革命提供了重要的国际参照与时代契机。早在1918年，孙中山便主动致电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声援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表达中俄革命力量携手奋斗的意愿，成为其“联俄”思想萌发的重要标志。列宁主张，“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孙中山逐步确信，“我国人民把俄国看作中国的朋友，这个朋友保证中国能够摆脱帝国主义列强，获得民族解放”。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飞签署《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宣称“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基于此，双方在联俄合作、苏联支持中国民族独立革命方面达成政治共识。联俄合作是孙中山革命生涯中重要决策之一，为后续形成革命统一战线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1924年1月，孙中山亲自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国共合作正式确立的标志。在孙中山的主导与推动下，大会重新阐释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为人民而设的”，赋予民族主义明确的反帝内涵，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致力实现“人人享受经济上平等之幸福，而无不均之患”，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石。

强力维系与居中统筹国共合作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存续与发展，自始至终伴随着国民党内部新旧派系的激烈博弈。自合作酝酿之初，邓泽如、冯自由等国民党右派，便上书弹劾共产党，蔑称共产党“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极力阻挠孙中山的革命政策。

面对右派的猜忌与恶意攻讦，孙中山多次严厉驳斥右派的狭隘派系思维。他深刻洞悉国民党的致命弊端，“顾其所以久而不能成功者，则以组织未备、训练未周之故”。他明确指出改组国民党、容纳进步革命力量，是挽救国民党、激活革命活力的途径。他批评国民党党内老同志思想稳健为“不及”，也批评“新同志”思想孟浪为“太过”，强调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并无冲突，不过范围有大小而已，甚至提出共产主义和民生主义“是一个好朋友”的说法。

为切实推动革命进行，孙中山亲自统筹人事布局，打破派系壁垒，注重发挥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等优秀共产党员的作用，并将中央组织部、农民部等关键实权部门交由共产党人主持，支持共产党人开展革命工作。共产党人同样认为两党“联合一个革命的战线”，“打倒共同敌对的军阀阶级”是唯一的出路。正是依靠孙中山的强力维系与居中统筹，合作初期的党派摩擦始终被限制在可控范围内，革命的统一战线大局得以稳固。

近代革命实践充分证明，孙中山维系合作、团结盟友的革命策略，是近代民主革命的正确路径。共产党人承认：“事实上必须暂时联合民主派才能够打倒公共的敌人——本国的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之压迫。”可见，孙中山作为革命领袖，具备超越时代的战略眼光与大局意识，其坚守合作、维系团结的行动，为国民革命的蓬勃开展筑牢了根基。

依托共产党改造国民党的弊端

孙中山推动国共合作，绝非停留在政治宣言与纲领革新的表层，而是以革命政策为抓手，依托国共合作的全新格局，结合共产党人的群众工作、宣传组织优势，全方位落实革命实践，彻底改造旧式国民党脱离群众、缺乏革命武装、基层薄弱的弊端。

在扶助农工、发动群众方面，孙中山一改旧式革命精英化、小众化的弱点，主动依托共产党人扎根底层、联系工农的优势，致力唤醒底层民众的革命意识。在孙中山的支持下，国民党中央工农部门全面开展工作，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由彭湃、毛泽东等人主持教学工作，系统性培养基层农运骨干，推动广东、湖南等地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府积极庇护工人运动，支持1924年沙面罢工，推动全国工人运动从低谷复苏。近代中国革命彻底摆脱了少数精英孤军奋战的局限，转变为声势浩大的民众革命运动。

在革命军事建设方面，孙中山深刻总结数十年依附旧军阀、屡战屡败的惨痛教训，创办黄埔军校，自任军校总理。他主动引入苏联先进军事理念，聘请苏联军事顾问，同时吸纳周恩来等共产党人担任政治教官，首创革命军队政治工作制度，为军队注入“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革命信仰，锻造出真正意义上的新式革命军队。

在全国革命宣传与组织拓展方面，孙中山依托两党力量，搭建起覆盖全国的革命网络。孙中山曾认为“俄国五六年来，革命成功，也就是宣传得力”。此言虽不全面，但也反映了他对宣传工作的重视。孙中山统筹安排共产党人参与国民党地方党部建设与全国宣传工作，将新三民主义与国民革命思想从华南一隅传播至全国各省，彻底打破了革命地域局限。一度改变了国民党此前“尚未能获一有组织、有纪律、能了解本身之职任与目的之政党”的现状，使国民党触角渐及全国。

孙中山一系列实践革新的历史性价值在于把三民主义从政治口号转化为动员工农、改造社会、救国救民的具体革命纲领，使其具备了改造中国的现实力量。这也证明孙中山躬身实干、以合作推动革命落地的历史功绩，凸显了其作为革命践行者的历史地位。

引领中国革命迈入全新历史阶段

学史明理

从宏观历史视野审视，孙中山推动国共合作的最大历史价值体现于其主动把握世界革命大势、契合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引领中国革命历史性发展，为近代中国革命的持续展开、统一战线理论的形成、民族复兴伟业的推进作出重要贡献。

纵观20世纪初的世界格局，帝国主义压迫与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对立成为时代主题。孙中山跳出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固有范式，摆脱依附列强的惯性，主动联合苏联等平等待我之民族、联合国内工农革命力量，走适合中国国情的民族解放道路，顺应了世界历史发展大势。这也和共产党人提出的“必须做统一的国民运动，使全国各阶级各党派各部分争自由争民权的各种势力，在一个统一的目标之下结合起来，成功一个有组织的广大的国民运动，才有充分反抗军阀的力量”的理论一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孙中山的革命抉择也给予高度历史评价，肯定其与时俱进的革命品格，赞扬其立足时代潮流提出三大革命政策、重新解释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实现了自身革命思想的伟大升华，引领中国革命迈入全新历史阶段。

孙中山积极推动并促成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大联合，激发了中国革命的内生动力。在孙中山奠定的合作框架与革命基础之上，大革命席卷全国，沉重打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与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其“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政治嘱托，更把握了近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规律，贯穿中国百余年革命发展历程。正如陈独秀所说，“两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National Revolution）的时期是已经成熟了，这个时期的成熟是可以拿十余年来的政治史及眼前要求打倒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呼声可以证明的”。

总之，在孙中山的努力推动下所形成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及其发展，为近代中国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与民族复兴伟业奠定了不可替代的历史根基，其革命实践与奋斗精神，具有跨越时代的深远价值与永恒的历史意义。

（上接1版）二是统筹处理好质态和业态的关系。科技创新能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但先进技术最终要依托具体业态落地。质态是生产力的本体，业态是外在表现。要把质优作为一切业态的导向，推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联动并进，防止把发展新质生产力窄化为只抓少数新赛道。三是统筹处理好改革和发展的关系。生产力发展到什么水平，生产关系就要调整适配。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通过改革，打破生产力发展的制约梗阻，形成与之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坚持改革和发展并举并重，把体制机制改革和制度供给贯穿发展全过程各方面。四是统筹处理好自主和开放的关系。要依托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和人才资源优势，吸引全球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在开放合作中提升经济实力和自主创新能力。五是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既培育壮大新动能，又前瞻研判技术伦理、数据安全、产业风险等隐患，完善法律法规、伦理审查规则及监管框架，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做到两翼齐飞、不可偏废。

把握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路径方向。《意见》强调，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这一指导要求，明确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引领力量、核心标志、主要路径和制度保障。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就是要把科技创新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第一要素，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就是要更加注重资源配置效率、生产组织效率和价值创造效率的提升，不能简单追求规模扩张。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就是要从技术、要素、产业三个层面协同发力，实现生产力质态跃升。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揭示了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内在机理。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则表明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把各方面创新贯通起来。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制度和环境保障。只有把生产力跃升与生产关系调整统一起来，才能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

认真落实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点任务

《意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部署了“五个创新”重点任务，科技创新解决“源头从哪里来”，产业创新解决“成果到哪里去”，发展方式创新解决“路径怎么走”，体制机制创新解决“制度怎么适配”，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解决“创新由谁推动”。“五个创新”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必须在实践中贯通起来、一体推进。

聚焦原创突破和高效转化，大力推进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决定着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能否从源头生长出来。《意见》围绕“干什么、谁来干、干成什么样”作出部署，涵盖基础研究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企业能否真正成为创新主体，关键在于投入结构和制度激励。2025年，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达到39288.2亿元，其中各类企业经费30394.4亿元，占比超过77%。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减免超过7600亿元，超过73%的受访“小巨人”企业享受到这一政策红利。这些数字反映的不仅是企业“愿意投”，更是税收制度在边际上改变了企业投不投、投多少偏好。同时，在新兴未来产业领域，企业创新愈发占据主导地位，如2026年前三季度，我国企业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金额全球占比超过了58%。对此，《意见》提出建立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提高加计扣除比例、将符合国家战略需求的企业研发项目按程序上升为国家项目，实质上是把创新资源的配置重心进一步向企业端倾斜，只有让企业站在攻关任务和创新项目的牵头位置，将国家意志与企业探索紧密结合起来，技术路线的选择才会更贴近成本约束和商业化节奏。成果转化环节的制度设计，同样在从“鼓励转化”走向“增强衔接”。2025年全国技术合同交易金额同比增长19.1%，其中涉及专利的技术合同成交额达1.18万亿元，高校和科研机构增长105.6%。但高校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仍停留在10.1%，说明促进成果转化仍有挑战。《意见》的切入点不是增加转化补贴，而是把转化任务前置到立项环节，要求立项时一体部署研发和转化任务，验收时考核应用实绩。

聚焦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产业是科技创新落地生根的土壤。没有产业环节的承接和放大，技术突破难以转化为新质生产力。《意见》从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数实融合和“人工智能+”等方面系统部署。截至2025年12月，全国规上工业企业开展数字化改造的比例已达89.6%，数字化设备普及率达到57.7%，石化、炼钢、炼铁等传统行业采购自动化设备金额同比分别增长17.3%、11.7%和12.7%。这些数据说明，传统产业的改造不是“要不要做”的问题，而是已经在规模化发生。《意见》提出，以国家标准提升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支持企业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开展产业基础再造工程、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制造业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工程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其深层意图是让传统产业在改造过程中积累数据、工艺和场景能力，成为新兴技术规模化验证和成本下降的第一站。反过来，脱离传统产业改造去谈新质生产力，新兴产业很容易变成无源之水。“人工智能+”行动把融合从数字化推进到智能化阶段。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30%，人工智能正在从单点试验走向行业扩散。但真正的分水岭不在于有多少企业“用了AI”，而在于AI是否被嵌入核心流程并产生可复制的效率提高。《意见》强调行业拓展和场景布局，同时要求构建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体现的是一种“用起来”与“管得住”并重的思路，以用促创、以创带用。

聚焦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绿色是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质态，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意见》从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推进能源革命等方面作出部署。一方面，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建设指向“载体怎么建”。截至2025年度，我国累计培育绿色工厂8336家，产值占规上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22%。绿色工厂及园区正在成为技术扩散的节点，节能降碳技术、数字化能碳管理、绿电直供等做法通过园区平台向面广量大的中小企业外溢。《意见》将零碳工厂、零碳园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与绿色制造业、绿色服务业、绿色能源产业并列，实质上是把绿色化理解为产业结构调整本身。当绿色工厂的能耗和水耗达到行业先进水平并形成可复制的管理规范，绿色就从“成本项”变成了效率差异和竞争壁垒的来源。另一方面，优化政策工具箱导向“激励怎么给”。2025年，全国碳市场配额成交量2.35亿吨，同比增长约24%，成交额146.3亿元。碳市场的意义不在于成交量本身，而在于它开始为减排提供连续的价格信号，使企业能够把碳成本纳入投资和技术选择的计算之中。《意见》进一步提出以全国碳市场为主体完善碳定价机制、扩大覆盖范围、加快自愿减排市场建设、推动多样化绿色金融产品，其政策指向是让绿色投入在市场中可以获得回报，而不是长期依赖财政奖补。对于新质生产力而言，这意味着绿色技术的竞争力将越来越取决于“在碳价约束下是否更经济”，而不仅仅是“是否更环保”。

聚焦构建新型生产关系，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要突破技术，更要调整生产关系，让各类先进要素顺畅流动、让创新主体形成稳定预期。《意见》在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市场监管、金融、开放等方面作出系统部署。有两大改革方向需要关注，一是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长期以来，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症结，不仅在于成果转化环节不畅，更在于选题、立项、评价的起点就缺少需求约束。《意见》要求在国家重大工程项目中按需部署科技任务，健全需求导向的选题制度、责权利一致的管理制度、应用导向的评价制度，实质上是把“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嵌入项目管理全过程；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和资产单列管理改革，则是从产权激励上解决“成果是谁的、转化收益怎么分”的问题。二是完善市场监管制度。新技术新领域往往走在政策规则前面，简单套用旧框架，容易出现“一管就死”或“一放就乱”。《意见》强调包容审慎、分类施策：对看得准的引导规范，对一时看不准的设置“观察期”，对潜在风险大的严格监管，对非法经营的坚决查处。对人工智能、生物等前沿领域，既要守住安全底线，也要为试错留出空间；既要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提升监管效率，也要通过知识产权综合管理和公平竞争制度稳定创新预期。体制机制创新的要义，是降低制度性不确定性，让企业敢投、科研人员敢上、要素流动畅通。

聚焦培养新型劳动者，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人才是第一资源，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最活跃、最具决定意义的能动主体。人才培养要更加突出自主可控和需求牵引。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人才数量、质量、结构的需求是全方位的。《意见》强调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优化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机制，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工学一体化技能人才培养模式，鼓励企业和高校联合定制化培养人才。其深意在于，学科专业和培养模式不能按学校既有惯性“有什么教什么”，而要随产业和科技趋势动态调整，把企业真实需求前置到培养环节。人才使用和流动要从“评人”转向“用人”、从“管住”转向“激活”。长期以来，“五唯”导向使科研人员评价与真实贡献错位，体制间流动也面临隐性门槛。《意见》明确提出，推动考核评价激励与报项目、发论文、评奖励适度脱钩，防止简单按“帽子”定薪酬、定职称、定待遇，同时畅通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的人才通道。实践已有不少积极动态，2025年我国深入实施“新八级工”制度，超过410万人次取得高级工以上证书，评聘首席技师、特级技师近3000人次。评价权从“看标签”转向“看贡献”，流动从“身份管理”转向“需求牵引”，人才要素才会真正向新质生产力集聚。

（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